第一章 北平全民抗战兴起（1937.7—1937.8）

第一节 卢沟桥——日本侵略者蓄谋必得之地

［咽喉要道］精美壮观的卢沟古桥，横跨在北京西南郊的永定河上。它因在建筑科学与建筑艺术上闪耀着灿烂的民族文化光辉而著称于世，又因1937年7月7日在此揭开了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序幕，成为抗战圣地而受人敬仰。

北京地区东、北、西三面环山，山势重叠而险峻，道路崎岖而狭窄，南面地势低洼，河流纵横，水网相连。其中最大的河流永定河出西山峡谷，如一条放纵的黄龙横贯北京西南。因此，北京虽然地灵物丰，又是帝王立都之所，却不便与外埠相通，尤其与华北平原以至中原地区相通更为不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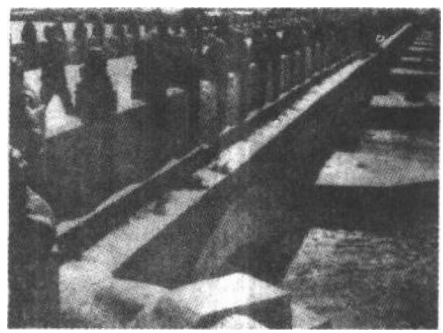


图1 卢沟桥

12世纪末，金王朝在北京西南郊的永定河上修筑一座联拱石桥，金章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赐名为广利桥。因北京地段的永定河古称卢沟，故民间一直以水名称其桥为卢沟桥，俗称日久，流传后世，就连官方文书也弃称广利桥而只称卢沟桥了。

卢沟桥桥长 266.5 米，由 11 个半圆形的石拱组成。桥宽约 8 米，路面非常平坦。桥面两旁共有 281 根望柱，望柱之间由石栏杆相连，上面雕刻着精美的花纹。在每根望柱的顶端都有一只雕刻成的大石狮子，只只神采各异。而这些大狮子身上或身旁还雕刻有三三两两小狮子，或坐、或卧、或相抱、或嬉戏，也个个栩栩如生。因为狮子多而千姿百态，有的在大狮子身上或身旁又若隐若现，于是民间一直有“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的传说。1961 年，经北京市的文物工作者用编号码、贴标签的方法，终于把狮子数清了。桥望柱上大狮子 281 只，大狮子身上或身旁的小狮子 211 只，加上桥东头顶着栏杆的两只大狮子和华表顶座上的 4 只狮子，共 498 只。

卢沟桥建筑的精湛技术和完美的造型，是中国桥梁建筑史上一座丰碑。它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和艺术上的辉煌，早在 700 年前就闻名于世了。13 世纪 70 年代，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游历中国，曾在他的《马可·波罗行纪》中称赞卢沟桥“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大石桥”。在国内，由于它本身的宏大精美，又与远山、近水、树木、晓月构成画面，因此早在金代就把这里列为“燕山八景”（清乾隆帝改称为“燕京八景”）之一，叫“卢沟晓月”。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文人墨客曾在这里洒墨抒怀，写下名诗佳句。清朝乾隆帝曾在这里御题“卢沟晓月”四个大字。这四个字当即被兴工刻碑，立于桥头。碑的雄姿和字的笔法神韵，至今仍为游人仰慕。

卢沟桥建成后，正如古人诗云：“卢沟石桥天下雄，正当京师往来冲。”（《日下旧闻考》第 5 册，第 1569 页）从北京通往华北平原乃至中原地区，卢沟桥便成了锁钥之所。“桥下水，东流

急。桥上客,纷如织。”(《日下旧闻考》第 5 册，第 1569 页）这正是此桥在古代车马行人过往纷忙的写照。

因卢沟桥为出入北京的要冲，所以也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金与宋、元与金为争夺燕地，及明燕王举兵靖难，无不以卢沟桥为用兵重地。自明天启元年（1621 年）起，为扼守卢沟桥，从都门至良乡界 50 里，每 5 里筑墩堡，各宿兵 10 名，以便遇有乱发，能协力出救。至明崇祯十三年（1640 年），为巩固京师防护，考虑到“卢沟畿辅咽喉，宜设兵防守，又须筑城以卫兵”，于是在桥之东，建筑城池，名为拱北城（清改名为拱极城）。城池东西只有 640 米，南北不过 320 米。“局制虽小，而崇墉百难，俨若雄关”，并“特设参将控制之”（《日下旧闻考》第 5 册，第 1558—1559 页）。至清朝，对城池“屡事修葺，设西路捕盗同知及巡司、游击各员弁驻守”（《日下旧闻考》第 5 册，第 1559 页）。可见，明清两代对卢沟桥的防卫非常重视，将其城池作为保卫北京的桥头堡，常有重兵把守。

清朝覆灭，民国改制。1928 年 6 月，国民政府明令改直隶省为河北省，改北京市为北平特别市，原北京各县并入河北省，将原治所在北京城内的宛平县迁至卢沟桥东侧的拱极城。此后，该城称宛平城。

进入 20 世纪，铁路、公路等现代交通设施已在北平周围形成一定规模，而卢沟桥又成了这些现代交通路线的交汇点。本世纪初，在卢沟桥北半里许，建造了一座铁路桥，1905 年，平汉铁路全线通车。这是纵贯中国中部的南北大动脉，而卢沟桥恰是这条大动脉首起北平的门户。而且，铁路桥还将平汉、平绥、平津三条铁路连接起来。平汉路在卢沟桥除主线直达北平外，还另辟两条支线，一条到通州，另一条到丰台与北宁路会合。此外，卢沟桥还有公路与北平、热河、喜峰口相通。为现代交通服务的修车厂、材料厂，也恰设在距卢沟桥不过 5 公里的长辛店镇。可

见，到了现代，尽管北平周围的地理环境发生很大变化，然而卢沟桥的战略地位却更加重要。卢沟桥无阻，中国北部便可东西、南北贯通，北平便可四通八达；卢沟桥被扼制，中国北部各大动脉之间便被切断，北平就变成了一座孤城。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野心由来已久，它已把侵占中国作为征服亚洲、称霸世界的必要步骤。在 1927 年日本的“东方会议”上出笼的《田中奏折》中赤裸裸地提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1931 年 9 月 18 日，在西方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缓和国内的矛盾，在沈阳向中国军队发动了疯狂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随后，日军向东北全境推进，占领了全东北。1933 年，日军又侵占热河，攻占长城各口，逼进华北。是年 5 月 31 日，又逼迫中国政府签订了（塘沽协定》，其中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而日本军队却可以在这条线以东以北地区自由行动。这实际上把冀东大片领土变为了日本的准殖民地。至 1935 年，日本又制造事端，迫使中国政府签订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



图 2　签订（塘沽协定）时的中日双方谈判代表

继之，制造华北“自治运动”,妄图把整个华北五省从中国政府的统治下分割出去，变为日本控制下的“特殊区域”。为此，1935 年 11 月，日本侵略者炮制了一个以汉奸殷汝耕为头目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同时，逼迫宋哲元实行

整个华北五省“自治”。南京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进逼采取妥协办法，决定于 12 月 16 日成立一个半自治性质的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由于“一二·九”运动爆发，推迟到 12 月 18 日才成立）。

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制造的一系列侵华事件，加紧了对中国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使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严重激化。华北已经危在旦夕。整个中国都面临着灭亡的危险。但是，南京国民党政府出于“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仍忙于打内战，消除异己，而对日本的野蛮进逼，却节节退让；同时，对广大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则采取残酷镇压。在平津，日本侵略势力甚为嚣张。日本的坦克纵横街衢，飞机随意低空飞行，荷枪实弹的日军在大街上横冲直撞，日本浪人到处为非作歹。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北平的爱国人士和青年学生不断遭到各种威胁和迫害。在此形势下，北平的学生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四册，第 382 页）

1935 年 8 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并很快通过在巴黎发行的（救国报》上刊载传入北平。《八一宣言》贯彻了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组织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挽救民族危亡的主张。

北平地下党组织收到《八一宣言》后，立即用各种方法进行传播。一些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积极响应，在地下党的组织下，“北平文化界救亡会”“华北救亡会”“华北民众救亡同盟”等群众救亡组织相继成立，并决定发动青年学生，举行游行示威，以挽救危局。1935 年 11 月 13 日，中国共产党针对华北的局势又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随后，于 11 月 28 日，又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军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这些宣言传入北平，对正在酝酿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更进一步的动员作用。

经过北平地下党的深入发动和精心组织，北平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意志凝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1935 年 11 月 18 日，北平市学生联合会成立。在该会的统一组织下，于 12 月 9 日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北平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的请愿示威游行。游行队伍向国民党政府北平当局请愿，提出反对防共自治运动，公开宣布中日交涉经过，不得任意捕人，保障地方领土安全，停止一切内战，给予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等六项抗日民主要求。这些要求被完全拒绝，请愿学生随即举行示威游行。数千名学生游行队伍先在西单，后在王府井南口，两次遭到军警殴打，有 30 多人被捕，数百人受伤。16 日，即原定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日子，北平有 1 万多人在天桥举行集会，一致通过《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收复东北失地》等决议案。并呼吁全国人民组织起来，共同抗日。会后，举行了比“一二·九”规模更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又遭到残酷镇压，学生被捕有数十人，受伤有 300 余人。



图 3　清华燕京等校学生 12 月 9 日在西直门外召开抗日宣传大会

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全国各地的响应。“一二·九”运动爆发的第二天，全国多数大城市相继爆发了声援北平学生，要求南京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学生运动。随之，一场空前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席卷全国。为了把以青年学生为

先锋的抗日救亡运动引向深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引导学生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组织平津学生宣传队沿平汉路南下宣传，上海、武汉、广州等地也派出学生到工厂、农村去宣传，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到 1936 年 2 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进步学生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使之成为党领导爱国青年的纽带。随后，不到一年时间，“民先”已发展到全国。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从 1935 年底开始有所转变。蒋介石在 1935 年 11 月 19 日的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对日妥协有一定的限度。11 月 26 日，国民党政府毅然下达了缉拿汉奸殷汝耕的命令。同月，不顾日本政府反对，坚持实行不利于日本经济掠夺的币制改革。从此，国民党政府在与日本的各项交涉中，逐渐强硬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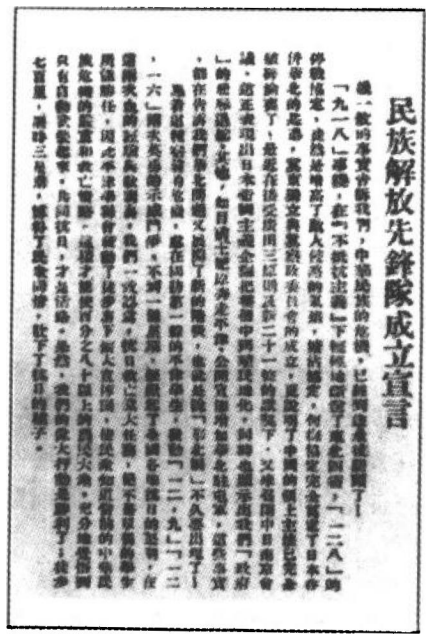

民族解放先鋒隊成立宣言

图 4　“民先”成立宣言

国民党政府转变对日政策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在全国各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以“一二·九”运动为标志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国

民党政府对日本的妥协政策越来越受到全国各界的谴责。面对这种形势，国民党政府不能不考虑在对日政策上是否要把人心失尽的问题。（二）日本侵犯华北，使国民党政府感受到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损害。在政治上，感到对日本妥协，并不能换取苟安，日本的攻势咄咄逼人，得寸进尺，旨在颠覆国民党政权；在经济上，日本以中日“经济提携”为幌子，加紧对华北进行经济掠夺。这不仅对中国民族工商业构成严重威胁，对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也带来了严重损害。（三）日本侵犯华北，也触犯了英美的权益，英美支持南京国民党政府抵制日本的侵略野心。这对亲英美的蒋介石政府在对日态度上不能不产生重大影响。

正当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中、下旬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正式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会议提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不仅是下层的，而且包括上层的；在抗日的前提下，有必要和可能与民族资产阶级以至地主买办阶级中一部分力量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甚至一部分军阀也有可能参加。会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和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

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和策略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会后，中共中央进一步加强了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一方面积极地促进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向国民党上层领导人和军队将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开展争取同盟者工作。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经过积极开展工作，于1936年春夏分别与东北军张学良和第十七路军杨虎城两位将军建立了联系，停止了敌对状态。同时，于1936年5月在对蒋介石的政策上也由“抗日反蒋”转变为“逼蒋抗日”。而

蒋介石仍坚持“剿共”政策，迫令张学良、杨虎城“进剿”陕北红军。在此情况下，张、杨二将军于当年 12 月 12 日发动了旨在敦促蒋介石进行抗战的“西安事变”。经中国共产党多方做工作，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和平解决的条件。至此，内战基本结束，建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

随着中日民族矛盾日趋恶化，在中国共产党及各界各派进步势力的推动下，国民党在 1937 年 2 月召开的五届三中全会上，接受了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人提出的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联合抗日的主张。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初步形成。国民党的对日政策也基本转变。

国民党政府由对日妥协转变为对日抗衡，宋哲元也由妥协转向强硬。日本帝国主义在用政治手段制造“华北自治”的阴谋难以得逞的情况下，便法西斯凶相毕露，决定用武力夺取华北，以至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北平是华北的政治中心，是冀察政府所在地。日本帝国主义欲夺取华北，不能不首先控制北平。当时的北平已经处在日伪势力的三面包围之中。在东面，河北省滦东地区 19 个县已经成了日军自由行动的地区，以殷汝耕为傀儡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所在地就设在距北平仅 15 公里的通县。站在朝阳门城楼上便能看见其政府的旗帜肆意招摇。在北面，日本侵略者制造了以德王为傀儡的伪蒙疆自治政府，日军帮助建立伪军，扰犯察绥，威胁北平。在东南面，日军于 1936 年 5 月中旬开始在丰台非法建造兵营，7 月下旬，日本华北驻屯军已强行进驻丰台。平北的昌平县被冀东伪政府所辖，因此，辖区内平绥线的要塞南口镇也被日伪势力所控制。这样，北平对外的通道只剩下一卢沟桥。

日本侵略者为实现占领北平、夺取华北、吞并中国的野心，对卢沟桥势在必夺。日军如果占领了卢沟桥，北平不攻自破，又

可利用卢沟桥的交通枢纽作用，沿平汉、平绥、平津各线，向华北及北方各省进犯。

日本侵略者控制丰台，是夺取卢沟桥的首要步骤。丰台位于北平西南，距广安门 12 公里，往西距卢沟桥 7 公里。丰台火车站建于清末，丰台支路虽然是平汉路的支线，但与北宁、平绥、平津各线的联络运输，都以此站为会合点。特别是与卢沟桥只有数公里之隔，在丰台设据点可随时扼制卢沟桥并寻机夺取之。

早在 1901 年八国联军逼迫清朝政府签订的（辛丑条约）曾经规定，准许各国派兵驻扎在京榆铁路沿线的山海关、秦皇岛、昌黎、滦州、唐山、芦台、塘沽、军粮城、天津、杨村、廊坊、黄村等 12 个战略要地。虽然《条约》规定为 12 处，及后来各缔约国又协定了驻军限额，但外国侵略者根据需要，其驻军渐渐地早已突破了所限地域，其驻军数额也远远超出，其中尤其以日军最为猖獗。

《辛丑条约》尚未签字，日本政府就以保路护桥为名，向中国派遣驻屯军，名为“清国驻屯军”，兵力不过 2600 人。1912 年更名为“中国驻屯军”。因司令部设在天津，又称“天津驻屯军”。兵营分两处，一部在天津海光寺，一部在北平东交民巷。驻屯军的编制有步兵队、守备队和宪兵队。步兵队是主力，其队部也是驻屯军的指挥机关。 1936 年 1 月，天津驻屯军更名为华北驻屯军。其编制级别提升，驻屯军司令官由少将级升为中将级；其活动范围不再局限天津地区。此后，驻屯军的兵力不断增加，权力不断扩大。至 1936 年 5 月，华北驻屯军增加到 8000 人。5 月以后，又增至 16000 人。

7 月下旬，日本侵略者为在丰台设军事据点，威逼卢沟桥，无视《辛丑条约》所限区域，肆意妄行，竟派遣河边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非法进驻了丰台。

[事端迭起] 从 1936 年起，日本侵略者为了给冀察当局施

加压力，逼迫冀察当局步步退让，以达到控制华北的目的，制造了一系列挑衅事件。

1936年 1 月 5 日，在朝阳门发生了日军鸣枪寻衅殴打中国士兵的“朝阳门事件”。是日晚 10 时许，日军一辆军车行至朝阳门，此时城门已闭，日军未带通行证要求进城，被中国守城警察张玉亭及保安队班长张巨挺阻拦。旋即，二人用电话向上级请示，经批准，立即开城放行。日军对中国守城警兵的积极请示、通融，不仅不表示感谢，反而以开城迟缓为由， 5 个人殴打张玉亭、张巨挺二人。二人被殴打致伤，鼻口冒血。日本兵又冲进宪兵驻守所，遇到二十九军守城排长解东启，竟肆无忌惮地鸣枪恐吓。在城上守备的二十九军官兵见状不得不鸣枪示警， 5 名日兵才爬上军车仓皇离去。后经交涉，双方派员到现场调查。日方以受伤中国警兵不能指认行凶日兵为由（因天黑无法看清），却反诬二十九军开枪射击了日军，竟向中国提出严重抗议，并扬言保留向中国提出要求的权利。为此，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向日本驻屯军提出抗议，反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此次事件，引起中外关注，使北平局势顿时紧张。

1936 年春夏，日军在北平城内外加剧制造紧张气氛。他们在从塘沽至北平的大小车站上驻上日军，只要有日本军车经过，就杀气腾腾地进行警戒。他们的飞机常在北平上空盘旋，部队常在市内大街上武装游行。 7 月 9 日上午一次游行示威，竟出动卡车、载重汽车、小型坦克、巨型坦克 30 余辆。车上架着枪，载着弹药，经菜市口、西珠市口、正阳门，一路耀武扬威。日本侵略军还以修筑军事设施为名，随意拆毁民房，毁坏庄稼，甚至拆毁象征中华民族尊严的古长城，并随便在大街上布岗设哨，在城门边上挖战壕，在民房上架枪架炮，构筑工事，搞军事演习。日兵手执武器踏墙上房，穿街过巷，无所顾忌。在东郊、南郊一带，他们随意侵占民房，夺取农民粮食，使农民不得安居，被迫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纷纷迁离故土。

丰台更是日军挑动事端的重要地区。1936 年 6 月 26 日上午，从张家口调驻丰台的二十九军一〇九旅二一七团三营官兵乘火车刚刚进入丰台车站，因火车突然鸣笛，军马受惊，四处奔窜，其中一匹窜入日本驻军正在修建的兵营内，被日军扣留。中国士兵追至日军兵营，与值勤日军交涉，要求归还军马。日兵蛮横无理，不仅不交出军马，反而将中国士兵打伤。日军借机寻衅，派出多人持枪出营房布阵，如临大敌，有随时交火之势。二十九军军官及时赶到，说服不甘示弱的中国士兵忍气离去。第二天，一名朝鲜流氓登门滋事，冲进二十九军三十八师马厩，硬说马厩属于他花钱买下，让二十九军立即腾出马厩给他。二十九军官兵虽然觉得此事离奇，但还是出示证明书，据理向对方解释。但这名朝鲜流氓竟蛮横地拔刀动武，并招来几十名日兵助战，致使双方发生械斗。事后，日军借此向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提出抗议，并无理要求二十九军撤出丰台。宋哲元拒绝了从丰台撤出的要求,但为解决此事,采取了换防的办法,调一一〇旅接替一〇九旅进驻丰台，此事才算平息。这就是所称的“第一次丰台事件”。

日军为了把中国驻军挤出丰台，以实现单独控制丰台的目的，继“第一次丰台事件”之后，时常无理挑衅，逼迫中国军队让步。7 月下旬，日军营房建成，强行驻进 2000 余人。此时，二十九军在丰台只驻守 1 个营兵力。日军凭借兵力优势，有恃无恐，横行霸道。8 月 31 日，日侨森川太郎闯入二十九军驻丰台军营，寻衅闹事，与卫兵发生殴斗，被卫兵刺杀。日军以此为借口，要求二十九军退出丰台。宋哲元派人与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进行交涉，答应可以赔款、惩办刺杀日侨的卫兵。但日军却坚持让二十九军撤出丰台。

前事未平，后波又起。9 月 18 日，是“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纪念日，二十九军丰台驻军第五连孙香亭部怀着悲愤心情在营

房外铁路附近进行军事演习。下午 6 时许、演习结束，在回营途中与日军在外演习的一个中队相逢，互不让路。日军骑兵在孙部队列中横冲直撞，孙部士兵用枪托击马自卫。日军声称受到侮辱，立即摆开交战阵势。中国军队也不示弱，严阵以待，准备自卫还击。日军向上级报告，又立即从北平调遣 1 个大队由联队长牟田口廉也率领驰援。援兵行至大井村附近与二十九军接触，展开枪战。日军趁机切断丰台通往北平的电话线，并层层包围了中国的丰台驻军，占领了丰台各要点，双方相持一整夜。宋哲元命令丰台驻军不要首先开火，派人与日方交涉，日方坚持让中国军队撤出丰台。宋哲元忍痛让步，将丰台驻军撤至赵家庄驻防。这就是所称的“第二次丰台事件”。随后，日本华北驻屯军派牟田口廉也联队所属一木清直大队驻进丰台的中国兵营。至此，日军控制丰台的目的已达到。

日军控制丰台后，便把卢沟桥作为下一步侵占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日军使用各种手段，向卢沟桥步步近逼。

继“第二次丰台事件”之后，日军以营舍不够居住为由，向冀察当局提出在丰台至卢沟桥的中国地带建筑兵营及飞机场。经 10 余次交涉，均被冀察当局拒绝。日方见冀察当局坚持不许，便私下从民间着手，以重利诱惑当地居民自愿租卖土地。绝大多数居民胸怀爱国心，不为日方所诱惑。有少数地主为重利所动，但“经剖切开导之后”，也不接受日方的诱惑。遂“由全体居民具呈县府，加盖手印，切实声明不能将土地出租或出卖，如果日军强占，决以流血相抵抗”（《七七事变》第 18 页）。日方见冀察当局与居民众志不渝，非常坚决，方觉阴谋难以得逞。

日军占地欲谋不成，就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从 1 个月或半个月举行一次，到后来 3 至 5 天举行一次；从用虚弹，到用实弹；从起初在白天演习，到后来改为夜间演习。演习部队主要是驻丰台的一木清直大队，日本侵略军以演习为名，在卢沟桥

附近到处流窜，侦察地形。并曾多次提出要穿过宛平城和卢沟桥到河西岸去演习，均被中国守军拒绝，并为此双方多次发生争执。后来，日方向冀察政务委员会提出这一要求，经交涉，冀察当局作了让步，命令二十九军驻宛平城部队允许日军演习时进出宛平城，但必须通知地方当局。从此，日军便可由宛平城通过，但仍不准通过卢沟桥。驻宛平城的二十九军官兵在日军通过时，严密监视，毫不却步。有一次日兵过城时，碰折一棵小树，被二十九军士兵发觉后立刻要求日军赔偿。日军无奈，由一名军官交付 2 角钱才了结此事。

日军见中国军队对卢沟桥的防卫寸步不让，便以更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相威胁。1936 年 10 月 26 日至 11 月 4 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动用近万兵力，以卢沟桥、宛平城为攻击目标，举行秋季大演习。演习范围包括北平、卢沟桥、长辛店、军粮城、大沽、通县等地。所到之处，庄稼被毁，居民遭难。小红门一带的白菜，被踏毁无余。所经之处未成熟的高粱，被强令割倒。有的农民不识字，误入警戒线，竟被日军活活杀害。 11 月 3 日，参加演习的日军会合于北平，车辆、坦克在城内横行。当日军经过朝阳门时，一名年仅 11 岁的小女孩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竟被日兵抓起扔到坦克车下，将小女孩活活扎成肉泥。日军这一暴行，引起群众极大愤慨，要求复仇的呼声甚高。北平学联为此事，组织学生自动停课，举行哀悼，进行各种宣传，声讨日军的罪恶行径，号召青年献身祖国，驱逐敌人。

至 1936 年底，无论日军如何威逼，卢沟桥仍牢牢控制在中国军队手中。中国方面为加强对卢沟桥及北平的防卫，在北宁铁路线上建筑一条由黄村到南苑的岔道铁路，又重修南苑小火车站，让铁路通到永定门；又把平绥线从西直门延长到西苑。这样更便于几个军事基地之间相互运输，及时增援。由此，日军欲取卢沟桥的阴谋更难得逞，用武力强攻，已是惟一手段。

第二节　二十九军拉开全民族抗战序幕

［暴风雨的朕兆］进入1937年后，日本侵略者为准备在卢沟桥发动侵华战争，一反往日常态，在外交上大放烟幕弹，制造一种谋求与中国友好的假象。2月，林铣十郎组阁，由号称“自由而开明”的佐藤尚武任外相。佐藤在外交上标榜“不尚武”，上台后立即开始对南京国民党政府、华北当局和英美等国施展“和平”外交。

3月间，日本银行家和实业家组成经济使节团来华访问，声称“只谈经济、不谈政治”。使节团主要成员几次与蒋介石、张群、吴鼎昌等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头面人物接洽会晤。使节团团长儿玉谦次表现出一副恭和友好的神态，一再表示要改变对华政策，协助中国统一和复兴，并且要求中国给以“合作”。为了表示诚意，日本方面还做出一些姿态，如：让伪蒙古军自动停战，停止对绥远、山西、南京及其它方面搞离间活动，导演德王发表通电，拥护南京国民党政府，并解散王英、张复堂的伪军部队。

在华北方面，日本政府向冀察当局表示出一种“谅解”和“公正”的态度，采取一系列伪善措施与冀察当局拉关系。4月间，华北驻屯军方面，邀请宋哲元、张自忠赴日参观陆海空军联合演习。此次邀请一方面向冀察当局炫耀武力，另一方面则表示“亲善和友好”。宋哲元派出以张自忠为团长、张允荣为副团长，以何基沣、黄维刚、李文田等人为代表的代表团应邀出访参观。

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堀内干城和海军大佐久保田等，为张自忠设宴饯行。出发时，田代和堀内又派代表到车站送行。在日本，代表团在所访问的东京、京都、奈良、大阪等地，受到各方面热烈招待。此外，华北驻屯军还拨给二十九军一个营的三八式野山炮。这种几年来从未有过的举动，使人感觉到过去华北驻屯军与二十九军之间剑拔弩张的局势已经过去。

在山东，日本侵略者也大放烟幕。松井石根大将亲率大型歌舞团来到济南，与韩复榘及山东省军政要员举行联欢。除日本歌舞团登台演出外，宾主在宴会上频频举杯，畅饮开怀，一派“友好”“亲善”气氛。

同时，日本对英美也施展起“友好”外交，表示愿意与英美两国保持友好的关系。日本声称日美两国之间没有什么“重大的悬案”；日本还主动与英国接触， 1935 年，日本推行“华北自治”，触犯英国利益，曾影响日英关系，英国帮助中国改革币制也引起日本不满，日本表示愿意修好曾经恶化了的关系，并且准备重新缔结日英协定。

日本这种一反常态的外交举动，企图让人盲目地相信，日本在修好中日两国关系，两国之间的矛盾会和平解决。但是，人们都不会相信日本的欺骗伎俩。人们不会忘记在此之前日本对中国的一系列侵略行径，都是以和平烟幕和野蛮军事行动交替施展的。和平烟幕的背后，往往掩盖着野蛮的军事行动。毛泽东曾于 1937 年 5 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明确地指出：“所谓‘中日提携’的宣传和某些外交步骤的缓和，正是出于战争前夜日本侵略政策的战术上的必要。”（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佐藤外交是大战的准备，大战在我们面前。”（毛泽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日本在和平外交背后，正在积极

做战争准备。首先，日本加紧进行军事准备。 3 月 24 日，为演习沿海登陆作战，有 70 艘日本军舰浩浩荡荡地驶进青岛。 4 月初，日本海军派人勘察天津塘沽港口，准备兴筑该港，以备战时用作军事补给线。5 月上旬，日本关东军向靠近平津的热河增派 1 个旅团，准备随时策应平津战事。

随之，日军参谋本部于 6 月份派侦探以“旅行”为名，窜到天津、北平、张家口、归绥、大同、太原、济南、青岛等地刺探中国内地情报。

就在加紧进行军事准备的同时，于 6 月 4 日，日本内阁重新改组。由表面上看比较温和，而实际上更具有法西斯野心的近卫文麿组阁。他所起用的外相正是提出侵华“三原则”的广田弘毅。广田是 1935 年 8 月提出侵华“三原则”的。主要内容是：（一）中国方面彻底取缔反日言论和行动。（二）中国方面正式承认伪“满洲国”及缔结一个规定日“满”华三国新关系的协定。（三）应使中国在与外蒙接境地区，对我方（日方）所希望的各种措施进行合作。其主要目的，就是让蒋介石政府承认伪满洲国，支持日本在华北建立亲日政权。由此可见，广田是侵华的极力鼓噪者。新组阁的陆相和海相分别由军国主义好战分子杉山元、米内光正担任。藏相由军需工业和重工业的代表、善于为军部编制预算的马场镁一担任。从而组成了发动侵华战争更具侵略性的内阁班子。

近卫内阁组成后，好战的军国主义分子不断地发出发动侵华战争的叫嚣。日本陆军教育总监本部部长香月清司到华北走一遭后提出必须增兵华北。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向新政府极力鼓吹给中国政府以武力打击为上策。广田外相也叫嚣中日关系已到“解决实际问题”的阶段。与此同时，驻华北日军已磨刀霍霍，剑拔弩张。他们从 4 月 25 日开始，在平津郊区及通县附近进行军事演习。从 6 月开始，日军在卢沟桥一带不断举行夜间军事演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